项　英

李良明

项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之一、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共六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长江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他一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但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尤其是在皖南事变中，也有比较严重的错误。

（一）

项英，原名项德龙，又名德隆，号江钧，笔名夏英、江俊、张成、张俊等。祖籍湖北省武昌县舒安乡项家垴。1898 年 5 月诞生于武昌粮道街 24 号（现 273 号）。其父项文轩，是个穷书生，读过几年私塾，后为武昌县钱粮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账房先生,管理全县的钱粮账务,项英十岁时,因病去世。母亲夏氏，是一个很能干的妇女，在困境中强撑苦斗,靠给人洗衣、纺线、刺锈所得的微薄收入,抚育项英和女儿德芳,时有断炊之虞。为补充家用,项英和妹妹常去拾柴、捡破烂卖。

项英先在武昌育才小学读书 4 年,后入武昌私立日新学校,15 岁毕业,因家穷,不能升学,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纺织科当学徒。出师后留在该厂当纺织工，逐渐成了一名熟练的纺织工人。但生活仍然十分艰难。他回忆说:“我每天工作时间在 10 个钟头以上，规定星期日休息,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① 尽管每日工作时间长,没有休息日,然而他每月的工资却只有八九元至十一二元,不能养母育妹。这时,项英似乎朦朦胧胧认识到社会的不平，要改造它，但找不到出路。

项英秉性倔犟、疾恶如仇。他不同亲戚家来往,也不肯求人。他的叔父项仰之是武昌慈善会的会长，有钱有势,但他宁可挨饿,也不同叔父往来,还常骂他叔父是一个吃人的光棍。

项英白天做工,晚上回家,还要坚持读书两小时、养

① 参见《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版,第 92 页。

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①]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成立了专门指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周刊》，并在武昌察院坡时中书店设立发行处。《劳动周刊》宣传劳动组合主义；报道工人阶级极端低下的生活状况；揭露资本家掠夺工人剩余劳动价值；还报道了上海、广东、湖南、江西、武汉、安徽等地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在工人中影响很大。项英被《劳动周刊》所宣传的革命道理深深感动了。他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②]

1921 年 12 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因反对车行老板加租而举行了同盟罢工，武汉中共党组织派林育南、施洋前往领导，使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武汉工人运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由于工人运动的开展，迫切需要一位适当的人来办理文书和联络工作。经小学同学李书渠的介绍，武汉中共党组织的考察，项英被派到武汉江岸担负筹备江岸工人俱乐部的重任。项英到江岸后，他深入工人群众中间，交朋友，宣传工人阶级团结、争取解放的道理，深受工人的欢迎。到江岸不久，即和杨德甫、林祥谦等几个负责人商量，租江岸龙王庙为俱乐部筹备处办公地址，京汉铁路江岸工

① ② 1979 年 3 月 19 日访问包惠僧记录。

人俱乐部的招牌也挂出来了。

1922 年 1 月 22 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是日,虽然雪后路途泥泞,到会来的工友们不下九百人。”[①] 中共武汉区委、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均派代表前往祝贺。京汉铁路的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各地的工人代表和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汉口人力车夫工会、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代表，也应邀出席、参观。大会最后选出了江岸工人俱乐部负责人：主任干事杨德甫，副主任干事黄桂荣，秘书干事项英，财务干事林祥谦，法律顾问施洋。

江岸段的工作开展得这样顺利,是党组织始料不及的。项英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费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显示了他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才能。

1922 年 4 月,经包惠僧、李书渠介绍,项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1922 年 7 月，项英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言，认为党

① 《汉口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盛况》,《工人周刊》第 28 号，1922 年 2 月 5 日。

内的工人同志太少是个缺点。他提议，应吸收大量进步工人入党,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会后,党派他前往郑州,参加 8 月 10 日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会议选出总工会筹备会负责人，杨德甫为主任委员，凌楚藩、史文彬为副主任委员,项英为总干事,吴汝明为副总干事。经过筹备会负责人半年多的辛勤工作，京汉铁路各站建立了 16 个分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 3 万多人，说明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3 年 1 月 5 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在郑州召开,项英又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定于 2 月 1 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人士到郑州参加典礼。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极端仇视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1 月 28 日下午，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到总工会传达吴佩孚的电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旋即派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 5 位代表前往洛阳,希图与吴佩孚谈判,打开僵局,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

怎么办？是坚持按期开会，还是屈从吴佩孚的压力？在总工会筹备会负责人讨论会上,杨德甫认为,吴佩孚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成立工会。工会既然是合法的，工会成立大会的召开就不能不是合法的。不过,为了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照顾他的面子,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凌楚藩说,吴佩孚既然准许我们成立工会，又不諒开总工会成立大会，这是自相矛盾。会期已经到了,交涉还没有办好,我们可以改期开会,或暂缓一二天,再派人与吴佩孚交涉。两人的看法不无道理,但实际上,都未能识破吴佩孚的假面具,对他抱有幻想。

项英持第三种看法。他认为,工人组织工会,求得解放,这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黄殿辰等辈是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工人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批准,那以后都要乖乖地听他们的话,那末我们的工会就没有作用了。他坚定地说：工会的招牌已经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工会是已经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什么话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把工会的招牌摘下来,大家散摊,不就完了吗?项英讲这番话时,眼圈红了,双手发抖,几乎掉下泪来。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宣告正式成立。吴佩孚气急败坏，先是下令全城实行紧急戒严;“路上布满军警,特别是到会场一条大马路有千余武装军队，梯子形横列在马路上约半里之长”[①],妄图阻

① 项英:《“二七”事略》,《红色中华二七增刊》,1932年2月3日。

止工人开会。项英和林祥谦、施洋、林育南、史文彬等率领工人代表与纠察队员,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来到了普乐园戏院会场,保证了成立大会按时召开。这时,吴佩孚更是恼羞成怒,派兵占住旅馆,并禁止各饭店旅馆卖饭给工人代表吃,限令外地代表立即出境,郑州铁路工会亦同时遭封闭。①

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总工会迁移江岸办公,4 日午刻实行京汉铁路全线大罢工。出席这次决策会议的有罗章龙、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震瀛、吴雨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项英也出席了这次决策会,大家推举他担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会后,项英与史文彬立即分头召集各分会代表紧急会议,传达总工会党团会议精神,强调全路一起行动,"在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不后退的"②。随后,项英与总工会领导人及武汉方面的代表立即乘火车南下。在列车上,项英和陈潭秋、林育南、林祥谦、施洋等,一起商讨罢工事宜,起草《罢工宣言》等文件(《宣言》的执笔人为林育南)。

4 日,京汉铁路工人争人权、争自由的总同盟罢工开

① 项英:《"二七"事略》。

②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周报,第 20 期。

始了。总罢工命令下达后，长 1 000 余公里铁路线，2 万余工人之众，不前不后，在一个时间内一致行动，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一致的精神。

5 日，湖北督军萧耀南企图派军警强迫工人复工开车。张厚生(号木阶，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参谋长)奉命到了江岸，命令军队驻扎江岸车站附近，同时派军警从工人住宅抓走两名司机，并在大智门车站贴出告示：从今天起客车照常行驶，可办理行李托运手续，云云。

江岸分工会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认为，这是直系军阀破坏罢工的阴谋，目的旨在企图利用广大旅客急于回家过春节的心情，挑拨京汉铁路工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他们镇压工人罢工制造借口。于是决定，立即派宣传员到大智门车站，向旅客宣传工人罢工真相，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派出纠察团员和工人，到火车站夺车要人。

纠察团员和工人群众 2 000 多人冲破军警的包围，终于抢回了被捕的两名司机，但又有 5 名工友被捕了。反动军警以这 5 名工友为人质，要挟工会交出被抢回的两名司机。这更激怒了罢工工人。愤怒的纠察团员和工人群众立刻包围了江岸附近的张厚生的驻地，高呼“：还我工友！”“谁破坏罢工就坚决打倒谁！”等口号。张厚生则要求工会派出代表谈判。

项英以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的身份，挺身而出，代表工

人前往谈判。敌人将项英扣押,并用枪威胁,要他下令复工。项英坚强不屈，拒绝了敌人的可耻要求。 2月 6 日凌晨，工人群众为了解救自己的代表，前往包围了军警，迫使敌人释放了项英。[①]

2月6 日上午,在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林育南等领导下,武汉工团联合会发动 1 万多名工人组成慰问队,各执慰问旗帜,携带大量慰问品,前往江岸刘家庙举行慰问大会。施洋、林育南、项英等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工人群众义无反顾，坚持斗争到底。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时 2 小时许,沿途加入 3 000 人,所过商民多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者,此种情形实为仅见”。[②] 项英、林育南、施洋、林祥谦等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2月7 日下午 2 时,张厚生率两营军队,包围江岸,随即派一个军官到京汉铁路总工会，要求派出全权代表谈判复工问题。项英与林祥谦等前往扶轮学校与张厚生谈判。他们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复工，遭张厚生拒绝。张厚生威胁林祥谦说:“我下令恢复交通,你下令复工,没什么可说的”。项英看出敌人的险恶用心,他们根本不是

① 参阅《星汉灿烂——(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烈士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2 页。

② 项英:《“二七”大屠杀的经过》。

来谈判复工，而是企图以谈判为名，逮捕罢工领导人。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项英想出了一个脱身之计，对张厚生说：“我们回去马上召集大家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张厚生得意忘形地说：“可以，快去。”走出扶轮学校，项英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队到工会集合。”并示意林祥谦不要回总工会，以便他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执行罢工任务，可是这时已来不及了，林祥谦被一个军阀军官紧紧盯住，被带往总工会，项英赶快去找纠察团。

下午 5 时，突然响起冲锋号声，一时弹如雨下，人声沸腾，杀声震野，空场内遍地是尸体，鲜血满地。曾玉良等 32 人已在军阀的枪林弹雨中牺牲了，被枪伤的数十人和当场的工人百余人被捆绑至车站月台上。林祥谦亦被捕。

这时，项英率 100 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冲进了车站，企图抢救林祥谦和被捕的工人，但是由于寡不敌众，没有成功。林祥谦壮烈牺牲。与此同时，京汉铁路全线工人罢工都遭到反动军队的镇压。当晚，敌人又逮捕了施洋，15 日被枪杀在武昌洪山脚下。这就是史称的“二七惨案”。

在“二七”大屠杀时，由于工人纠察队被乱枪打散，项英一直潜伏在江边，到黄昏时，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长清里一位同志的寓所，在那里建立起京汉铁路总工会联络处，与林育南、许白昊等调查工人死难情况，并成立济难会，进行善后工作。

反动军阀得悉项英等仍在坚持活动,于 3 月 23 日发出通缉令，通缉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 17 名工人领袖。[①] 项英不顾被捕牺牲的危险，仍坚持工作，直到党组织通知他转移。

项英先转移到长沙。

在长沙,项英会见了毛泽东,并进行了长谈。他们分析了形势，检讨了“二七”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李维汉回忆说:“‘二七’罢工失败后,党中央曾有对‘二七’罢工事件的指示信，要我带给许白昊和项英，因接信地点汉口‘真报’和施洋律师事务所都已被破坏,罢工已失败了,所以将信毁去，将钱带去长沙。到长沙的当晚，在自修大学遇见项英正同毛泽东同志谈话。”[②] 于是李维汉将钱交给了项英，并向项英说明了带信的经过。

随后,项英离湘赴沪，与林育南立即设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联合全国各界同胞继续同军阀政府作斗争。

（三）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

① 《汉口新闻报》,1923 年 3 月 23 日。

② 《李维汉同志给武汉二七纪念馆的复信》,1980 年 12 月 28 日,转引自《大罢工资料选编》,工人出版社 1983 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州召开,项英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项英根据党中央指示秘密潜回武汉。其时，中共武汉区委设立了劳动委员会,专门领导工人运动,项英是劳动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仍然分工负责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他还和许白昊共同负责人力车夫工会的工作。

1924 年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武汉区委撤销,先后成立了中共汉口、武昌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党中央直接领导，项英在中共汉口地方委员会继续负责工运工作。同时，他还是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工农部长。①

5 月 13 日,萧耀南派军警突然搜查中共汉口地委机关吉庆街德润里 5 号,逮捕了许白昊、刘伯垂、杨德甫等 7 人,并通缉项英、林育南、李汉俊、李书渠等。与此同时，国民党汉口执行部机关也遭破坏。② 于是,党调项英到上海工作。其时,党在上海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办起了 7 所平民学校。项英以沪西平民学校为据点开展活动，担任沪西平民学校教师。在沪西平民学校讲课的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刘华等人。他们通过教工人识字,讲演时事、故事等形式对工人进行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并在工人中发展党团组织。同年 8 月，在沪西平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

① 参阅张宣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国民党概况》,《武汉党史通讯》1985 年第 4 期。

② 《向导》第 68 期,1924 年 6 月 4 日。

项英任俱乐部主任。

192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在这次会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如何加强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①]。会后，党派项英返回武汉，作为中央驻汉代表，负责指导武汉地区党组织的工作。[②] 但不久又被调往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2 月 2 日,内外棉八厂日籍领班无故踢伤一名 12 岁的女童工，并殴打前来向他讲理的女工，还将粗纱间 50 余名阻止日本工头行凶的男工除名，用他们认为较易控制的‘养成工’来代替。工人代表找日资本家进行说理斗争,日资本家竟勾结工部局,逮捕工人代表。

共中央决定因势利导，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当即决定组织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回击日本资本家,并成立了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刘华、杨之华等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具体领导罢工。罢工前的一切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是以沪西工友俱乐部名义出面的，项英夜以继日地投入紧张繁忙的战斗。蒋自强、许维之回忆说:那时,项英不顾一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5 页。

② 《中共中央第一号通告》,1925 年 1 月 24 日。

切“冒着风雪和同志们四处寻找罢工工人集合的合适场所；他深入到工厂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和周密布置罢工；他反复和工人骨干一起商讨向日本资本家提出的各项条件；他深思熟虑地和同志们一起着手成立工会的准备工作。为了组织罢工……项英把全部身心都扑了上去”。[①] 在项英等组织发动下，9 日下午，内外棉第五、七、八、十、十二厂 9 000 余名工人结队出厂，高呼“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到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前的空地上集会，宣布实行同盟总罢工。项英与邓中夏、李立三等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亲临斗争第一线，指挥这场战斗。

罢工的烈火迅速蔓延，到 18 日，参加罢工的工厂有 22 个，工人近 4 万名。日本资本家慑于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威力，不得不请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3 月 1 日，被迫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不许无故打人，不许无故开除工人，厂方要按照工作量增加工资、发还储蓄金”等条件，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

经过罢工斗争，工人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懂得了团结的重要，于是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决定进一步发动纱厂工人，筹建上海纱厂总工会。

3 月 8 日，100 多名工人代表齐集沪西工友俱乐部，

① 蒋自强、许维之：《项英同志与上海二月罢工》，《文史资料选辑》1981 年第 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5 月版。

讨论成立总工会事宜，会上分发了新工会会员登记表。刘华、项英等出席了会议，并要求与会代表用‘团结就是力量’的口号，争取更多的工友加入工会。会后，筹建纱厂总工会的工作全面展开，由项英具体负责。项英广泛联系各厂工会，做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使工会组织迅速扩大，几日内，新加入工会的会员达万余人。

日本资本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签字墨迹未干，便自食其言，不仅没有答应工人代表提出的条件，反而变本加厉地打骂、开除工人，扬言要取缔工会。5 月 7 日，上海日商纺织同业会商议了取缔的具体办法。同时，他们又乘纱价低落、棉货升高之机，四处招收女工，为开除男工作准备。果然，女工招齐后，便将二月罢工中的工人骨干全数开除，以招来的女工替代，借以打击工会势力，还以关厂相威胁。

工会派出代表与厂主交涉，日资本家不仅不理，反将代表一律开除。5月 14 日，日本资本家趁机把十二厂以及有关的七厂关闭。15 日，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 10 余名。这一暴行，更加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慨。

为扩大罢工斗争的影响，动员全市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斗争，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决定 24 日举行全市规模的追悼顾正红大会。追悼大会公祭以后，恽代英、向警予、项英、杨之华分别向群众发表演说，号召工人群众团

结一致,坚持罢工斗争,为烈士雪耻报仇。

30 日,上海各校学生 3 000 余名,到租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英国巡捕丧心病狂地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等 13 人,打伤数十人,逮捕 50 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展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号召上海全市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31 日,代表上海 21 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宝山路宝山里(后迁共和新路),公开挂牌办公。李立三任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实际上是秘书长）。总工会下设六个办事处，第四办事处主任是刘华，刘华因病，不久由项英接替。上海总工会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从 6 月 1 日起,实行全市总罢工。第二天,上海全市实行了罢工、罢课、罢市。

帝国主义者极端仇视和害怕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方面继续实行"铁血"政策,进行镇压;另一方面施展种种阴谋，妄图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日本资本家派人与顾正红家族族长顾雪桥勾结。顾雪桥是上海青帮头目之一。他见利忘义,以族长的名义,妄图从日本人那里领取 1 万元酬金,私自了结此案,破坏五卅运动。项英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派张维祯带领 40 名纠察队员,把顾雪桥带到第四办事处，狠狠地教育了一顿，让他写了悔过

书,找了铺保,保证不再搞出卖勾当。[①]

(四)

1926 年 5 月 1 日至 21 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项英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1926 年 9 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前夕,项英奉党组织之命重返武汉。当时武汉工人运动在北伐战争推动下空前活跃,各级工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仅 9 月上旬,已恢复的工会组织就有 30 多个,还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会组织。[②] 为了统一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9 月 14 日,项英与许白昊主持召开武汉各工会代表会,决议将武汉工人代表会改为武汉总工会。9 月 17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建立,办事处主任为李立三,秘书长为刘少奇,项英任宣传部长。10 月 10 日,湖北全省总工会正式成立,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硚口 3 个办事处和工人纠察队,项英等先后任纠察队队长。从此,湖北工人阶级有了自己公开的战斗司令部。据统计,1926 年 10 月至 12 月,湖北省总工会"指导了 150 个工会以上的经济斗

① 张维祯:《五卅回忆片断》,《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上海总工会 1985 年编印。

② 参见《大江报》,1926 年 9 月 11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